

# 问 学 感 想

——写在母校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庆典之际

## 詹石窗

作为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的第一届研究生,我虽然已经离开母校多年,但每当忆及求学的日子,我的心潮就久久难于平静。因为这里是我走向专业研究之路的起点,也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正像婴儿一样,我在这里吮吸了乳汁,获得了健壮骨骼的种种营养。这里的草木楼台启迪了我的灵感,这里的图书文献开发了我的智慧,这里的良师益友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人生道路往往由于某种机缘而发生转折,这于我来说是有深刻感触的。本来,我喜欢文学,曾经梦想当一个文学家。还在中学时代,我就经常读诗与小说,并且写点杂感什么的;但我直到目前为止却没有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倒是进入了一个自己也曾感到陌生的宗教研究领域。

我接触宗教研究问题,说起来很偶然。1978年秋季,我考上大学。在厦门大学哲学系里,开头两年主要是学习哲学基本理论、政治经济学、革命史一类的常规课程。或许是由于阅读的疲劳性积累,从“大三”开始,我就觉得身体不舒。慢性肠炎加上神经衰弱,不仅致使学习成绩下降,而且大大消耗了体能。近一年时间,断断续续服药,并无明显效果。在此等情形下,我开始注意寻求精神调节途径。那时,本系何乃川教授正讲授《宋明理学》的选修课程,我不假思索地选报了这门课程。在上课过程中,何先生阐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与道教的关系,谈到先天图、太极图及其道门养生意蕴,这引起了我很大兴趣。后来,我到何先生家拜访求教。他向我介绍:图书馆有《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不久,我即在图书馆借阅了这部在中国道教研究史上具有重大开拓意义的著作。读了这部书,我对道教总算有了一点初步的了解。不过,我初读这样的书时,并没有试图从事道教研究工作的念头,更没有想到后来自己能够成为该书作者卿希泰教授的弟子,而只是希望从书本上找到

治病的线索。于是,沿着《中国道教思想史纲》涉及的有关问题,我查阅了厦门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一些道教文献。在这里,我看到了一本沾满灰尘的署名白玉蟾撰的《修道真言》。由于这本小册子讲了许多比较容易实施的精神调节方法,我很快就被吸引,并作了摘录。书中所说的借助山水存想意境以制服心猿意马的诸多格言像春雷般声响在我胸中激荡。我反复念诵摘录下来的《修道真言》,经过两三个月,原先的神经衰弱、慢性肠炎竟然不知不觉消失。这增进了我对道教文化的兴趣,并且促使我选择了以道教经书研究为题的大学毕业论文的写作。《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二十五辑所刊载的《试论〈参同契〉对“纳甲法”的应用》一文就是我在大学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尽管这篇文章还显得比较粗糙,但却记录了我迈到道教文化研究边缘的一段足迹。

1982年夏天,我由组织派遣到福建省三明市干部学校。一种继续深造的愿望强烈地从心底升腾起来。经过单位批准,我一边工作,一边准备硕士研究生的应考事宜。考什么专业呢?这是首先必须选择的。查了以往的许多专业目录,似乎都兴趣不大。经过几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后,《中国道教思想史纲》那古色古香的封面闪现在我的眼前。我突然萌发了与作者联系的念头。当时,我还不认识卿先生,也不知道先生的确切通讯地址,但记得出版单位地址是四川成都。我猜想,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的肯定是传统文化功力深厚的大学者,既然出版社地址在成都,作者极有可能是四川大学的教授。我试探地写了一封信。记得当时信上地址只写“四川大学:著名道教思想史研究专家卿先生收”。没想到这封信还很顺利地寄达了。卿先生在复信中告诉我,他将在1983年招收宗教学专业道教思想史研究方向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表示欢迎报考,并鼓励我努力学习。这封信虽然写得很短,但却充满慈祥暖意,使我最后下定了报考道教思想史研究方向的决心。那时,报考宗教学专业,在许多人心目中,乃是不可思议的事。一些好心的朋友惊奇地问我:“读宗教学专业?你想当和尚啦?”我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解释,似乎也用不着解释,只是微笑,表示我听懂了他们的问话。从此,我每日处理完单位事务后即闭门读书。经过四个月的准备,最终考取了该专

业硕士研究生。入学的时候,业师卿先生亲自到学校门口迎接。第二天,当我办理好注册手续后,卿先生和研究所的其他老师又到我的宿舍问寒问暖。在我的第一印象,业师卿先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后来,我开始系统学习研究生课程,才感到卿先生又是一个严师。他非常严格地按照学术规范对学生进行训练,学生有缺点,他一定会以合适的方式给予指出。当然看到学生没有很快纠正缺点,他也会发脾气,所谓“恨铁不成钢”,这在我师从卿先生治道教思想史的几年中确确实实感受到了。

1984 年,中国第一次《周易》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筹备组给卿先生发来邀请函。卿先生决定提交论文。他把我召到家中,谈了正关注的一个问题。他说,“过去许多人总把《周易》仅仅当作儒家的经典。其实早期儒家罕言天道,倒是道家学派更关心天道问题,这一点恰好与《周易》的天人相应思想相吻合。道家的这种思想对道教又有重要影响。在《道藏》中,有不少易类文献,这个问题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咱们就以《道教与周易的关系初探》为题吧。”先生教我如何查找文献,并且列出了提纲的大致方向。我根据先生的指点,搜集了一些材料,写了初稿。先生逐字逐句加以修改、补充、润饰。这项工作的完成,使我真正体验了做学问的严肃性与基本操作的方法,同时也逐步强化了我探究易学与道教关系数问题的兴趣。在我撰写硕士论文《南宋金元的道教及其思想》的时候,有关这一时期《道藏》内易学类著述也就可以比较顺利地加以研读了,其中第三章《解经畅玄,易老学的发展》可以说就是沿着《道教与周易的关系初探》思路进行研讨的结果。

1986 年夏天,我从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后,到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任职。该研究所在行政上隶属中文系。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机缘,我结合以往的道教知识结构,酝酿了《道教文学史》的研究计划。我把这个计划首先寄到业师卿先生那里,请求先生给予指点。先生不仅给予热情洋溢的鼓励,而且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在我日后数年的道教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卿先生时常来信询问进展情况,解答我提出的一些难题。1989 年,汉代至北宋部分的《道教文学史》书稿完成,卿先生又于百忙之中亲自

作序,对其学术价值给予充分肯定。这实际上是把青年学者向学术界作了介绍和推荐,其扶植后进之热心,充溢于字里行间。

1992年5月,拙著《道教文学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书严格说来实际上只能称作上卷,因为所涉及内容仅到北宋为止。南宋以后,还有相当内容需要考察,这不是短时间所能完成的。在后来的研究中,我愈发感到“道教文学”研究与传统易学的密切关联。易学讲“观物取象”,而道教文学作品则充满象征。要把南宋以来的道教文学考究清楚,很需要把道教思想体系中的易学底蕴探索明白。我越读书,越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古人有云:“学而后知不足”。在读了相当一些道教经籍以及其他中国古典文献之后,我对先圣所说的这句话终于有了较深的理解。既然明白了自己知识的缺陷,这就更加需要再学习了。1993年,我尽管已经评上了副教授,但还是决定报考博士研究生。我确信经过再学习对于我正在进行的一些研究课题必定有新的助益。1994年,我重返母校四川大学。这次重返母校,业师卿希泰教授再度到校门口欢迎。我下了火车时是雇一辆三轮动力机车代步而行的。在准备向司机付款时找来找去找不到钱,卿先生看我着急的样子,立即掏出钱来替我付了款。事情过后,我的硕士生学习阶段的师妹、博士生学习阶段的师姐风趣地说:“詹师兄,先生亲自来迎接你,这是很高规格的。”此时,先生年岁已六十有八,两鬓略添白发。他的关爱着实令我感动,也激发了我新的学习热情。在重返母校四川大学开始新的学生生活的日子里,尽管学习紧张,但当母校领导与研究所的所有老师同学送来热情与关心时,一切疲劳都抖落到脑后去了。

如今,我虽然远离了母校,但师友情谊却把我与母校命运永远联系在一起。在母校的怀抱里,我有一种特殊的安全感和归宿感。我虔诚地祝愿我们的母校宗教学研究所像抵御严寒的高山劲松,万古常青;像炎夏六月的朝阳,光芒四射!

附录:本文作者,詹石窗,系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后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任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任厦门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客座教授、《道韵学刊》主编、国际易学联合中心专家委员、福建省宗教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海峡交流协会高级学术专员等职务。已著有《道教文学史》、《道教术数与文艺》、《道教与戏剧》等书十余部,与业师卿希泰合编《道教文化新典》,参与撰写《中国道教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